

我怎樣成爲 最高蘇維埃代表

昂 蓋 林 娜 著
孫 源 譯



昂蓋林娜 著
孫源 譯

我怎樣成爲最高蘇維埃代表

中興出版社

我怎樣成爲最高蘇維埃代表

Ma Reponse A Un Questionnaire Americain

作 者 昂 蓋 林 娜

PRASKOVIA ANGUELINA

譯 者 孫 源

原出版者 EDITIONS EN LANGUES ETRANGERES

譯本出版者 中 外 生 活 社

原書刊期 Moscou 1949

譯本刊期 一九五一年五月初版

★ 有 版 權 ★

京初(0001 — 8000)

我接到了美國寄來的一封信。一個相識的女教師給我譯了出來。這封信通知我，紐約百老匯路二百九十六號出版了一本「世界名人傳記大辭典」，說世界各國的傑出人物都收在裏面。

此外，這封信又肯定這點：所謂「傑出人物」，應該瞭解為，首先是聯合國的領袖們；然後……原子彈的創造者，最後再輪到其他科學，藝術、文學、工業方面的代表人物。

信箋頭上，繪着一幅大大地展開着的世界地圖，上面橫着一本厚厚的大書；繼者通知我：女代表帕拉斯和亞、昂蓋林娜的名字也包含在「世界名人傳記大辭典」中，請我把附來的問題表填好寄去。

我發現問題表上的問題都是通常的問題（姓名、出生年月、地點等等）；

此外是請我列舉「自開始做事以來直到今天」的職務，寫明榮銜，勳章，工作地點，住處，父母親和子女們的名字和狀況，軍事功績，已印成的著作以及其他不少事情。

我這樣回答的：

「昂蓋林娜·帕拉斯柯維亞·尼基琪什娜。一九一二年生於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斯大林諾區，斯泰洛——白謝伏村（我現在就住在斯泰洛——白謝伏村生活，工作也在那裏）。父親：昂蓋林·尼基泰·瓦西里葉維什，集體農民，以前是農業工人。母親：昂蓋林娜·埃斐米亞·費杜洛娜，集體農民，以前是農業工人。我於一九二〇年開始做事，與我父母一起在一個富農那裏當短工。此後，於一九二一年和一九三二年之間，在「亞歷山葉伏——拉斯尼昂斯卡耶」礦井當推煤車工人；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七年，重新當農業工人；一九二七年後，在那個後來成為列寧集體農場的前耕種合作社當家畜管理員，自一九三〇年至今（共中一九三七年一九四〇年停頓了兩年，在其

斯科的鐵米里亞謝夫農業學院進修），當拖拉機手。現有三個孩子：斯凡特拉娜，瓦萊里和斯大林娜。自一九三七年起爲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的黨員。現爲農業勞動工會的會員。已印成的著作：除了一九三八年在基輔出版的『我的工作隊』小冊子外，可以舉出在報紙上雜誌上發表的許多文章以及有關拖拉機工作隊中的工作組織和其他農業問題的演說辭，在這些演說裏，我報告了我的經驗並企圖分析我的經驗。至於戰事功績，我認爲最光榮的是：那個我們曾經照顧過的砲兵大隊的戰士們所贈予我的『保衛團士兵』的頭銜，他們贈我這頭銜爲的我在戰時最艱難的條件下在大後方做的工作好。我是阿姆弗洛西葉弗卡第四七四選區的蘇維埃聯邦的最高蘇維埃代表。我的榮銜和勳章？我是社會主義勞動英雄，斯大林獎得獎者，蘇聯農業展覽會的大金章的得獎者。我兩次得到列寧級勳章，一次勞動紅旗章以及其他許多勳章……」

這問題表這樣的瑣碎甚至問到了，例如，我結婚的日子，我母親少女時的名字等。但是，在這些問題中我却找不到一個重要的問題：像我那樣以前是一

個不識字的農業女工怎麼會成爲一個政治家，一個最高蘇維埃的代表？

相反的，這個問題倒在問題表寄到以前許多時候，有一封美國來信上提出問我的。這封信是美國亞拉巴馬州一個名叫朋吉明·馬丁的莊稼漢寫來的。

他以「很壞」兩個字簡短地談到他的事業。我不用翻譯，就懂得，意思是「不幸」。

他却並不關心到我的結婚的日子。他要知道的倒是：在蘇聯，怎麼會有像我這樣的傳記：農業工人——拖拉機手——政治家。

我曾讀過『亞美利加』和『大不列顛盟邦』兩個雜誌（前者是專在蘇聯發行的美國出版的雜誌，後者是英國駐蘇大使館出版的刊物——原註）。我得到這樣一個印象：在這兩個雜誌裏，好多東西都說成天花亂墜，與馬丁所告訴我的恰恰相反。但是這點，我們暫時不去提它……

這些外國刊物裏，『令人頭昏眼花的事業』，『特殊』的傳記倒也很不

少。

例如，我記得有一篇令人興奮的文章，說到一位「出身於平民」（照該雜誌的說法）的先生，以一個小販開始，賺下幾百萬，後來成為許多種出版物的主人而封為勳爵。

我想：那部名人錄一定將我們兩個人的小傳一前一後放在一起（我的放A字母部份，而勳爵的放在B字母部份）——原註：此地影射皮凡爾勃魯克勳爵 Lord Beaverbrook——。關於他，那部名人錄一定這樣記載：「姓名，出生年月日，結婚日期，父母貧窮，曾為小販，後成勳爵」，而我的則為「姓名，出生年月，結婚日期，父母貧窮，曾為農業工人，後成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

我的美國朋友朋吉明·馬丁和其他千百萬這樣的人讀了之後，一定要問：「差別在哪裡呢？」

的確，沒有這個主要的問題：「怎麼會那樣的？」，那末對於一個蘇聯人所經歷的道路，同時也是我所經歷的道路就無法瞭解也無從予以評價了。尤其

重要的是：這不僅是我個人的偶倖，因為我的上升並不是一件例外的事。假如，正如同那個刊物所說的，這位先生是「出身於平民」而「上升到人民之上」而成爲勳爵，那末我的上升却是與全國人民一起上升的，我是與全體人民一起成爲蘇聯的英雄的。而這一點就是最主要的一點。

因此，我決定越出「世界名人傳記小辭典」所寄來的表格的範圍，與其對高貴的編輯部母寧對千萬美國的莊稼漢來談談這個主要的問題。順便，我也可以回答了生活在我們廣大的聯邦各地區的蘇聯同志們寄來的千萬的信中所提出的另一個問題「你怎麼長大的？」

今天，蘇維埃已達到三十年，回顧一下它所經歷的途程，追叙一下我們國家動人的歷史，同時也是我們每個人，蘇聯每個人民的履歷也是很恰當的。我們的命運是那樣地與我們的國家和黨的命運聯結在一起，追述一下我們的工作，我們的成功，我們的悲哀，我們的快樂，我們自然可以看到比我們個人的履歷，更偉大百倍的東西。

我們所有的一切好的東西，我們的知識，我們所以富有、強大、幸福，一切我們應該歸功於蘇維埃政權的勝利。

好幾年來，我駕駛着拖拉機。在我說來，這不止「單單做我的職業」。拖拉機就是爭取五年計劃的實現中我的戰鬥崗位，也是衛國戰爭中的我的戰鬥崗位。拖拉機是我的快樂、幸福和光榮的來源……

同我一樣，拖拉機一詞在蘇聯全體人民看來，代表着比「裝有內燃發動機的一部曳引機器」更多些意義的東西。因為靠了拖拉機，整個農村生活改成新的方式了，它消除了把土地硬生生地割成小塊的無數田壟，它引導了千百萬的農民走上了集體農莊的生活……

拖拉機……已經有十三年了，但我永遠不會忘記那一天，那德依達·康斯當第諾娃，克魯潑斯卡耶，於教育人民委員會招待會後，領了一批農村少女（我也在內）去參觀列寧墓。

我們摒着呼吸在列寧靈柩繞了一圈……當我們出來，到紅場時，那德依

達·康斯當第諾娃輕聲地對我們說：

「他多麼夢想蘇聯有十萬部拖拉機……」

當一九三〇年春天，我第一次坐上一部拖拉機時，我對於列寧這個夢想並不清楚，也不知道那時已經有了幾千部拖拉機了。一九三〇年所有的六萬名拖拉機手中，我是唯一一個女的。這當然，我也並不曉得。

我可得得斯大林和黨所正在進行的農村事業規模之偉大，斯大林和黨是以超過理智的熱情來進行這事業的。

一九三〇年是集體農莊鬥爭勝利的一年，是那一年才完成了農村生活中的一個大轉變。那時正在第一個斯大林五年計劃時期。

廣大的蘇聯境內到處出現了許多新的工廠，尤其是青年們到處前進着。

在斯泰洛——白樹伏村，晚上我們在俱樂部裏，五年計劃圖表前開着會。

我們談到了我國的前途，我們青年本國的前途，國家與個人兩者不可分離的遠大和光明的前途。

但是這些明天，我們每個人都不能袖手等待着它們自己到來：我們是積極的共青團團員，我們遠遠地沒有達到，在本村被動的生活上，應起的作用的程度。

可是好像還有許多比斯泰洛——白樹伏本村範圍更重要更困難的事情在進行着；因此我決心到一個工廠裡去工作（當然是到一個五年計劃突擊工作的工廠去工作）。我貪婪地翻閱報上的廣告，這時報紙上充滿了：「徵召工人……」的廣告。

到哪裏去？遠遠地，遠到西比利亞去建設庫茲納什克，那個未來的花園城市？或者到聶伯洛斯特洛伊？或者……為什麼要走得這樣遠？我們的村子正位於頓納茨的中心，而且週圍四面八方，都有突擊工廠：有哥爾樂弗卡機器工廠，正在建設中的克拉馬托斯克機器工廠，又有著名的魯盛可伏的煤礦，亞左斯泰各工廠……

我的哥哥伊凡對我說得好，在斯泰洛——白樹伏村完成五年計劃同到別的

地方去完成五年計劃都是一樣的，我可不願意聽他的話，我要走！

伊凡是本區第一個拖拉機手，黨的地方組織的書記；不久他被送到城裏去繼續學習，而我就決定留在斯泰洛——白樹伏村替代地駕駛拖拉機。

開頭，大家都譏笑我。但是既然沒有人代替伊凡而拖拉機竟變成無父母的孤兒了，大家才同意我來試一試。我哥哥教會了我，大概知道些怎麼對付發動機。經過一個短時期的學習，我居然也能夠應付了。大家於是對我說：

「好，幹吧。可是小心些啊……」

一天絕早，我第一次到田裏去。天很冷，但我的雙頰發着燒。我的拖拉機轟轟地發着響聲而我呢，不時地回頭朝後看留在後面的第一條犁路，它一直伸長起來，翻出黑色的土，冒出輕微的蒸汽……我真要歌唱，盡力的叫喊了……

我決心要成爲一個拖拉機手，而我真的成爲一個拖拉機手了。

在今天說起來，當然很容易，但在一九三〇年春天，却是堅苦的，這叫我付出了不少努力，不少的眼淚的代價啊！

但是我不怕困難，也不計較辛苦。當時，我十八歲，已經是個「老資格的青年團員」了。共青團團員是習慣於困難的，他們已克服了許多困難，而且還有許多困難要加以克服……

一九三〇年，斯泰洛——白樹伏村發生了與其他村子同樣的事情。富農被打敗和驅逐了，於是建立了列寧集體農莊。拖拉機可以在不成田壟的整片土地上犁田了。

這一切要求於我們的是一個很大的努力，但一切還像個初生的嬰孩那麼的軟弱。

我記得我父親曾半玩笑和半認真叫自己為「家庭黨小組」的組長。他自己是個共產黨員，我三個哥哥：瓦西里，尼哥拉伊，伊凡都是共產黨員；我的哥哥柯斯基亞，我妹妹樂拉和我是共青團團員。黨和團的小組關於組織集體農莊，消滅富農以及宣傳工作同時一起壓在我們身上了。

我真幸福有那麼一個家庭！

我的村子自一九二七年已有一個互助耕種、作社。但富農還鞏固地保持着土地，他們還很有勢力。而我們只有自己在工作中學習些經驗。

合作社必須要用富農的農具、耕畜和原始的收割機。

當分配收成時，不但要用麥子來償付勞動，而且還得付農具、牲畜、機器的租金。

因此，我們永久的敵人，富農尼哥拉葉維什·薩文，多少年來我們爲了幾個可憐的銅子給他幹過活，他的生活還是繼續比我們好。他把他的馬、牛、沒有打麥機的刈收機租給合作社，而他自己可以不工作。但他一個人收的麥子比我們一家七個人整個夏季背脊晒脫皮的還多。

當然，並不是僅僅我們才期望着一個更爲公平的辦法；農民們都希望，在農村裏能建立起一個制度來，保證收穫歸到勞動者手裏，而不歸到寄生蟲手裏去。

而黨看事情是朝遠處看的，他把農村推向集體農莊途上去，「集體農莊章

程」正是我們盼望已久的東西。……

我永遠忘不了在教堂前面所舉行的全村大會。我父親平時很嚴肅極少講話，那天他第一次發了演說。我現在還聽得到他說的話：

「瞧，鄉親們，這是堆石頭。看是很大的一堆……但是我們很可以推倒它，我說不用手，腳一踢就成了。」我父親，爲了證實他說的話，他提起靴子朝那一堆石頭的尖端上一塊大石頭踢了一腳那一堆石頭就嘩嘩滾滾下來了。『你們看……這些石塊既不光滑而大小也不一致。可是你可以拿來造一座牆。你按它們形狀，凸的凹的拼起來，緊緊疊在一起。這些石頭就成爲一座牆了，你們五個人來推也推不倒它了。我們是農民，我們就是各顧各，正像這一堆石塊，我們應該聯合起來結成一個集體農莊……我們應該像石頭一樣一塊靠一塊地團結起來。這樣，我們就成爲一股誰也推不翻的力量了。』

我父親說完了話，走下了教堂的石階。全場以一陣死樣的靜寂來回答他。這種集會普通是人聲噪雜的：即使爲了募集一筆小小的款子造一個圍牆也會

引起全場騷動，議論紛紛的，而這次與整個的生活有關的大事，給他們帶來了光明的大事，大家倒靜默了……

爲什麼？

因爲這時候，我們村子的情形還很複雜（其他許多村子情形自也相同）。中農躊躇不定，等待着，怕受騙，怕選擇了一條壞路。而富農——列弗特洛夫，薩文，昂托諾夫，巴尼奧托夫之流——擁有一切農具，他們是力量，因此大部份村民繼續像過去一樣，不說尊敬他們，至少也怕他們。

但是我們，我們却不怕……

我們就此與這些對一切新的事物懷有不共戴天之仇的有勢力的富農打開了仗。

瓦西亞·昂蓋林是貧農委員會的主席，收到這類的條子：「主席，滾你的蛋吧，離開村子，不然就剝你皮！」

但是瓦西亞是個共產黨員，他不但不是「滾」，而且不屈不撓地繼續他的工